

# 传统三个世界格局改变中的中国地位

汪晖

摘要：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相对放缓，但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最快的。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不是孤立的现象，相较于其他地区，整个东亚地区都是快速增长的区域，而且这个区域的经济融合也是迅速的。中国的兴起并不等于中国会取代美国的地位，但是中国和东亚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上升将改变传统的三个世界的格局，为世界的多极化的形成做出贡献。这次金融危机是标志性的事件，它不是一般性调整，而是大的结构性变迁的一个环节。

我们以中国这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为例，观察中国面临的挑战。关于金融危机，中国的专家和一般社会都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个争论是，到底是金融危机还是经济危机？这两者本来是相互纠缠的，但在理论上做出区分还是重要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大部分媒体将分析的重心集中于美国次贷危机和金融投机，但也有另一些政治经济学家，如Robert Brenner，则指出这次危机不仅仅是一般的金融危机，不仅仅是金融衍生品的问题，其根源是由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值得研究。如果只是金融衍生品的问题，就是过度投机和缺乏有效监管引起的问题。如果是经济危机，就说明资本主义有其结构性的危机，不只是少数人投机，而且是生产方式的问题造成了危机。其实，两者是相互关联的。金融危机不可能不与整个生产方式有关系。中国的情况与美国有所不同，危机主要集中在实体经济方面，由于经济结构高度依赖国际市场，而国内消费又严重不足，虽然国家的刺激计划及税收减免维持了经济增长，但如果不能改变经济结构，通过促进社会保障和社会平等以促进内需，就有可能造成新的产能过剩。即便在金融领域，两个方面的问题也是纠缠在一起的，比如中国的高额外汇储备和所购买的美国国债的安全性问题备受关注，这一问题的形成，除了与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及美元霸权有关，又产生于国际炒家由于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而进行的金融投机。实体经济危机是跟金融危机连在一起的，不可能截然区分。

另外一个争论是，目前的危机到底是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的？现在看来，这两者的情况也是相互纠缠的。所谓周期性的危机，意味着经济可以自我恢复到危机之前的状态；如果是结构性的话，则意味着不太可能恢复到过去的结构，会有结构性的变化。从目前来看，经济状况会恢复好转，因此危机有周期性的特点，但未必能够回到原有的结构。例如，金融体系是否还会恢复到新自由主义高潮时期的模式？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欧美的金融机构经历了大规模的国有化，各国政府都大力干预经济和金融，即便政府开始调整其刺激计划，并从银行系统退出，金融体系不太可能完全回到原有模式。

再比如，由于环境危机、能源问题及在上一个发展进程中被破坏了的社会关系需要重新修复，掠夺性的开发方式所支撑的高速经济增长很难持续，大规模提高普通工人的社会待遇、逐渐改善生态环境的进程已经不可逆。最近美国提出大气变暖和节能减排的问题，环境问题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议题，国内有人提出其中包含的新帝国主义的问题。利

用环境问题对第三世界施压，逃避发达国家的责任，是的确存在的现象。但不能否认气候变化带来的普遍影响。大气变暖的问题很严重，而且速度很快，南北极和喜马拉雅山的冰川融化，部分地区湿地的消失，一些地区的沙漠化，中国的江河湖泊的严重污染，华北地区水资源匮乏，这些问题意味着原有的生活方式无法持续。长期做这方面调查研究工作的文佳军在她的文章中以太阳能热水器和农村沼气池的运用为例，说明中国在节能环保方面其实做了大量的工作，与此相应，过去一段时期，清洁煤电技术渐居领先地位，风能发电等也发展迅速（但也有人批评说，后一发展也存在盲目上马的现象）。但问题是发展主义和消费主义仍然深刻地影响中国的发展模式，以更为迅速的态势造成环境压力。

从上述角度说，出口导向型经济必然会发生变化。第一，为了规避长期的经济风险，拉动内需以改变过度依赖出口的状态，势必导致经济结构的变化；第二，在全球市场条件下，出口产品的升级换代也是适应新的全球经济结构，改变过度剥夺国内劳动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必要选择；第三，随着美国经济地位的逐渐衰落，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全球经济关系势必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这种转变也势必投射到国内经济关系之中，比如美元地位的变化，人民币在国际结算中的地位增强，以及其他区域性贸易的重要性的增强等等，都意味着经济结构会有所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不是一般的周期性变化，也是全球性的和结构性的变化。现在中国经济已有触底回升的迹象，但如果没有结构性的调整，会迅速遇到新的结构性危机，尤其是新的产能过剩导致的金融体系不稳定和其他社会问题。即便是为了应对经济危机，重建全面的社会保障体制、提升环境工程的水平、促进经济结构的升级、重建城乡的有机互动和平等关系、加大教育投资、修补并发展为盲目的发展主义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将是不可避免的选择。这些问题都不是短期问题，而是长期的、结构性的问题。

从历史上看，大规模经济危机发生之后，社会体制和社会思潮均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经济危机除了导致了新的社会政策的出现外，战争、革命、社会运动也往往是副产品。旧式的大规模社会运动模式如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及阶级斗争似乎发生了转型，虽然有局部性的战争，但不是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战争；局部的战争没有引发二十世纪的那些暴风骤雨般的革命，而是新型的抵抗类型。在中国，围绕国企改革发生的冲突已经绵延多年，由于长期没有有效的解决方案，一些利益集团和基层政府强行推行私有化计划，导致最近一个时期社会斗争中的暴力现象；由于区域差别、城乡差别及贫富差别而产生的民族矛盾也有尖锐化的迹象，无目标的社会报复取代了早期社会运动的模式。从政治的角度看，经济危机与政治变迁的关系也是不确定的，比如美国，奥巴马当选总统，推动医疗保险计划，无论成功与否，至少透露了某种程度向左转的态势。但欧洲在政治上是右转的，萨科齐、默克尔、贝鲁斯科尼的当选就是明显的例子，英国工党风雨飘摇，而且也说不上左或不左。最近朝鲜和伊朗发生的事态则是地缘政治的延续。在这个背景下如何分析重大的变迁？最重要的不是换上了哪个领导人，即便是换上了某个看似进步的领导人，在国际领域，他们会扮演什么角色也是很难说的。

因此，在我看来，经济危机所导致的一个最正面的变迁，是新自由主义的绝对支配地位的衰落。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在1980年代越来越强化，到1990年代达到高峰，但在科索沃战争、9·11事变之后，新自由主义及新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遇到很大挑战，到这次危机，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广受质疑。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中心的一套论说，在广大的社会中不再获得绝对信任。这并不是说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会很快衰落，也不是说它的后果会很快消失，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的后果将在很长时期

内伴随着我们，但它的霸权地位被彻底地动摇了，寻求新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上升为清晰的社会意识和政治价值。围绕新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价值的争论仍然会持续，但这是在其衰落过程中的争论。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表现在地缘关系方面。地缘关系和全球权力关系的转变是长期的过程，但经济危机将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从资本主义历史来看，以往每一次重大的危机，都伴随着权力关系的变化。例如，美国的霸权地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逐渐确立的，苏联的霸权地位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冷战就是两霸支配的结构。伴随着这些新霸权的确立，旧的霸权体系不可挽回地衰落了。今天不再是简单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时代，需要分析新的地缘政治关系与权力关系的转变。比如，在金融危机中，美元的霸权地位没有被彻底动摇，但受到削弱，其地位的下降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希拉里访问中国时，温家宝直率地表达了对中国在美资产的安全感到“忧虑”。中国领导人的忧虑是真实的，它的前提是依附性的经济关系的形成；但从外部来看，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如此直率地向美国领导人表述他们对于霸权性货币的忧虑，这在十年前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中国对美元的信心动摇，改变依附性经济模式的努力获得成功，势必对美国的霸权地位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危机之前，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正在朝向新自由主义方向变化，但在金融危机中，中国的银行变成世界上市值最高的银行，中国的银行系统也是相对稳定的银行系统。也就是说，以美欧为绝对中心的经济—金融体制正在遭遇挑战。中国经济到底存不存在某种模式，现在争议很大，但讨论模式的意思，是对旧的模式、旧的霸权的怀疑，这也是为什么在其他地区，人们对中国模式的热衷常常超出了中国人自身。

过去几百年，全球权力中心发生了几次转移，但每次都在西方内部。这次不一样，欧美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亚洲的地位特别是中国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美国在长时间内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霸权，但不再是绝对的霸权，而且也必将是逐渐衰落的霸权。长远来说，这一变化的世界性影响会很大。值得注意的是，变化不止发生在中国，前段时间的金砖四国会议和上海六国会议密集地召开，并且提出了它们对全球性问题的看法。关于金砖四国的讨论，争议和分歧很大，但这一概念挑战旧的世界秩序却是显然的。中国对外贸易用本币结算的比重越来越大，这种双边结算模式的意义不仅限于双边，而且是全球性的，意味着对既有霸权的挑战。特别提款权问题的提出，即便不能马上投入实践，也是重要转变的信号。

伴随经济增长的重心部分向太平洋地区或者东亚的主要经济体转移，世界性的权力关系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即便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相对放缓，但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最快的。这一增长速度对于世界经济而言，是一个积极的因素，尽管单纯的经济增长对于中国的结构调整也带来了许多问题。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不是孤立的现象，相较于其他地区，整个东亚地区都是快速增长的区域，而且这个区域的经济融合也是迅速的。中国的兴起并不等于中国会取代美国的地位，但是中国和这一区域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上升将改变传统的三个世界的格局，为世界的多极化的形成做出贡献。这次金融危机是标志性的事件，它不是一般性调整，而是大的结构性变迁的一个环节。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原有的世界性的霸权构造，不仅是纯粹的经济霸权和经济结构，而且是一套政治社会关系和文化价值。目前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开始，文化和政治的变化，则需要更多的创造性的工作。新的模型和社会关系的产生不是自然的结果，需要人来塑造。如果这次危机带来的结构性转变只是地缘关系的转变，那就不过是霸权关系的转移而已。

今天需要讨论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中国要什么样的国际地位？中国要什么样的社会关系？要什么样的政治文化？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思考经济危机与新政治的关系、新文化的关系。就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发生了新文化运动，并促成了新的政治的发生一样，我们也要问金融危机与政治的关系。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也在寻求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和市场。中国在非洲和其他地区的存在西方引起了许多议论和不安，那么，中国能否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但找到一条另类的发展的道路，而且也不重复西方在其他地区做过的方式？这是一个重要的挑战。中国曾经有过国际主义的传统，也十分关注第三世界的命运，中国在第三世界、尤其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声誉，至今仍然受惠于那个传统。这些传统在市场化 and 全球化的条件下还有可能产生作用吗？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是具有扩张性的，它对能源及其他资源的需求，无论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都具有扩张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的现代国际主义的传统需要被重新提出来——不是那种输出革命式的国际主义，而是真诚关心和尊重第三世界国家的生存、发展和社会权利，在全球范围内探索一条平等、民主和共同发展的道路。放弃对霸权性的世界构造的分析，不可能对中国在全球的定位做出深刻的、准确的分析。

事实上，国际地位的问题与国内关系的转变是相关的。中国要发展怎样的商业、政治文化？它与美国式霸权有何区别？它应该不同于早期资本主义。市场在文化与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不能让市场逻辑变为宰制的逻辑。从经济体制来看，劳动者地位应该有显著的提升，生态和自然环境应该得到改善。重点在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变化，但这一点现在的讨论最少。目前的结构性危机也是旧的主导型的模式的危机，现在是创造新政治的时候了。

（作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